

湘東老蘇區雜記

王西彥著



新文藝出版社

湘東老蘇區雜記

王德信著



新華書店發行

湘東老蘇區雜記

王西彥著

新文藝出版社

一九五二·上海

湘東老蘇區雜記

著者 王西彥

《封面圖：王 珂：『鬥爭地主大會速寫』》

※
※

有 版 權

1952年6月第一版上海印0001—3000冊

1952年8月第二版上海印3001—6000冊

書號 (319) [I III 12] 定價 ¥ 5,900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上海康平路八三號)

光藝印刷廠承印

※
※

三聯·中華·商務·開明·聯營聯合組織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售

目次

喜悅和感激(代序).....	一
重見太陽的墓碑.....	三
兄弟團員.....	三
一個鄉副主席的經歷.....	四
甫老子和他的癩腳姪兒.....	五
再記甫老子.....	七
控訴他——一個造鈎了孽的劊子手.....	九
孔吉生和他父親的頭.....	一〇
姚輝蓮.....	一三
附錄：爲了和平的戰爭.....	一四
後記.....	一五

喜悅和感激（代序）

我於一九五〇年冬，參加湘東老蘇區的土地改革工作。因為下鄉得比較的早，所以在土地改革開始以前，在平江第二區的止馬鄉幫助鄉村幹部做了一個月準備的工作，修整塘圳，推動冬耕，整頓組織等等。隨後土地改革開始了，又在那裏工作了整整的兩個月。

不待說，我的工作做得很不好，不够深入。然而，就個人說，收穫卻並不是沒有的。我原是一個出身農村的人，在我的叔伯兄弟之中，都是一些樸實而勤勞的農民。在久住城市以前，我自己也曾參加過耕種勞作——最初是作爲一個牧童，侍候着一張牛嘴巴；後來是下田打「小老虎」（割稻時站稻床角，紮稻草把），湊一個班子。因此，在進入城市以後，雖然過着城市生活，但朋友們都說我依舊帶有濃厚的農民氣質，把我看做「鄉巴佬」。而我自己，也儼然以「地之子」自命（我在一本小說集的序文裏，便曾經這樣寫過），還大膽地寫了一些表現農村生活的作品。總之，我自以爲是一個懂得農民和農村生活的人。然而，經過了這一次的參加土地改革工作，使我發覺到，我以前所知道和了解的農民和農村

生活，不僅膚淺，而且已經完全是屬於過去的了。和我記憶中的農民和農村生活相比較，現在的農民和農村生活，已經呈顯着一副全新的面貌了。

特別是，我這次所參加工作的地點，乃是二十年前的老蘇維埃區域。這給發生在那裏的階級鬭爭，帶來了很大的特色。這裏的農民，經過了「庚午年」（一九三〇）那一場血的洗禮，有了很深的階級仇恨，也就有了很高的階級覺悟。平江原有七十萬人口；由於一九三〇年的大鬭爭，減少到四十萬。從這數字上，我們便可以想像那一場鬭爭的激烈程度。我曾經和很多個親自經歷了那一場鬭爭的老農民交談過，詢問過他們的遭遇和感想。不待說，他們多半不是當時蘇維埃政權裏的主要負責者（那些人十九都已經光榮犧牲或越過湘贛邊境參加後來更大的鬭爭中去），但每一個都是那場鬭爭的參加者。他們都是一些土地委員、裁判委員、十人團團長——最多的是赤衛隊隊員。他們每一個人都有着一連串驚險的故事，而他們所知道的別人的悲壯故事和慘烈景像則更多。回憶到那些往事，在他們爲皺紋擠成歪曲的眼睛裏，便汪盈起熱淚。不過，他們更是興奮的，他們看到了目前的局面，他們曾經是爲了今天的局面的直接的鬭爭者和犧牲者（他們的父母兄弟及子姪們中間，很多成爲革命的烈士），尤其是，他們曾經靠了自己的鬭爭和犧牲，一度實現了那崇高

的理想。一個六十多歲的老農民，二十年前的鄉蘇維埃委員，這樣告訴我：「庚午年的時節，紅軍退啦，反軍（白軍）來啦，我們幹蘇維埃的，死的死，逃的逃，算是失了敗啦。不過，我們心裏明白，失敗是暫時的，革命終究會勝利的！我只有一个崽，他幹了少先隊，跟着紅軍上了山。我夫娘（妻）捨不得他走，我便說：『你不要拖他年青人後腿！你讓他去！革命一定會成功！反革命笑我們石板上栽不成葱，你信不信——石板上就是栽得成葱！』——他一去便沒有消息，我心裏沒有半個悔字。一年，兩年，五年，十年，我等著。不瞞你說，同志，我就是害怕我的命不長，害怕革命成功時我的骨頭會已經成了灰！可是，你看嘛，我不還能再活上個十年嗎？毛主席可已經把反革命打倒啦！」理想的火，一直沒有在他們心裏熄滅。這便是一種無畏的力量。就靠着這火種，現在在這曾經被鮮血染成赤色的土地上燃燒起更大的鬭爭的烈火。

三、鬭爭的烈火更是一種鍛鍊，使農民們在鬭爭的過程中把自己鍛鍊得更堅強。在過去，一提到農民和農村生活，便會使我們聯想到一連串不好的字眼——頑固、自私、落後、愚昧、貧窮、愁苦、悲慘和黑暗。但現在，由於先進的工人階級的領導，在這場改變自己的命運的鬭爭裏，他們一向被壓制着的智慧和勇敢得到了一個最好的表現的機會。他們在鬭

爭裏獲得了光輝的勝利，他們從被統治和被損害的地位一變而爲主人翁。就是這種勝利的獲得和主人翁的感覺，在他們心裏培養起自尊和自信，也培養起莊嚴的責任感。最重要的是，他們開始有了土地，有了美好生活的希望。土地、生產、民主，這是今天農民生活中三個不可分離的環節。農民們必須享有土地，必須做土地的主入。有了土地，才能生產，因爲土地便是生產的最主要的資本。而在爭取土地和提高生產的過程之中，培養起過民主生活的習慣和能力。因此，在有了土地，有了過民主生活的習慣和能力的同時，農民們便有了對生活的樂觀的態度。在今天的農民和農村生活之中，愁眉苦臉的日子已經成爲過去了。農民們，正跨着勇敢而堅定的脚步，走向照耀着勝利的光輝的明天。

在幾個月的農村工作之中，我所經驗到的驚奇和喜悅的感覺，在這裏自然不能詳細剖述。我只想提一提一件事情，便是，我是一個文藝工作者，我的參加土地改革，一方面是一個土地改革的工作幹部，另一方面卻有着異於一般工作幹部的獨特的任務——這二者實在是相成的：你作爲一個土地改革工作幹部的工作做得愈深入，你作爲一個文藝工作者的收穫便愈大。而我，因爲在土地改革工作上做得不好，所以在一個文藝工作者的收穫上也就不能豐富。雖然情形是這樣，我還是寫下了一些小東西。如果說農村生活是一個海洋，

在這個海洋裏，一個有志者應該捕捉到大魚，那麼，我現在所捕捉到的卻只是一些米蝦。不過，即使是米蝦吧，在我自己，也仍然是珍惜的。也許有人很鄙視這種捉米蝦的工作，我可不管，我決定先把這點米蝦呈獻出來再說。是不是在我的網罟裏，還能搜尋到比米蝦稍稍值得重視的魚類呢？現在不敢說，我只能鞭策自己，不要放棄自己的努力。

話說得很明顯了，這個小小的集子，它只是一小撮小小的米蝦。我把這個小小的集子題名為「湘東老蘇區雜記」，似乎太誇張了。是的，我承認這是一種誇張。湘東老蘇區有着一個很廣大的地面，我的雙腳只踩到了其中很窄小的一塊。但我也有我的辯護。收容在這小小集子裏的幾篇雜記，大部分都是在工作中抽時間匆促寫下來的。寫出一篇，便給編輯朋友寄出一篇，先後陸續在刊物上發表。在寫作的當時，原想多跑幾個地方，多搜集一些革命故事，所以便取了那樣的一個題目。現在，我仍然保留着它，因為，縱使我所工作的地方，只是整個湘東廣大老蘇區的一個小點，它總之仍是其中的一部分。

再則，照題目看，我所寫的應該是一些真人真事。不錯，我所寫的，的確是真人真事。但依照我的看法，文學藝術上的形象，總應該是一種綜合的形象。我們寫真人真事，並不是寫一切真人真事，而是有所選擇的——選擇那最富於代表性的。這選擇，我以為便是一

種綜合的本領。而且，就是經過選擇之後的真人真事吧，在我們的筆下，也有了兩種情形：其一是把真人真事無改造或少改造地寫下來；另一便是把真人真事加以合理的加工和發展。我要說，第一種情形所說的「無改造」，實際上恐怕是不大可能的，多多少少，你總得改造一下——集中一下，剪裁一下，緊縮一下。我在寫收容在這個集子裏的幾篇雜記時，兼有上面所說的兩種情形。因此，如果有人責備我把真人真事寫走了樣，我便有了我的解釋。我應該承認的是，我寫得太草率了。在執筆的當時，我的確是處在一種很匆促的情形之下的。有幾篇雜記，還是伏在地鋪上和凳子上寫下來的。現在把它們編成一集，也沒有加以好好的修飾。但是即使草率，我要再說一次，我實在很珍惜這些雜記。

仔細地想一想，我對這些雜記的感情，根源便在於我熱愛被寫在這些雜記裏的那些人物，熱愛發生那些故事的地方。我在那裏雖然工作得並不長久，我對它卻已經發生了深厚的感情。只要一回想起那一段日子，便有一些善良樸實的農民們的臉孔浮現在我的眼前……

我不能忘記那裏的青年團書記兼鄉主席，一個剛滿二十歲的青年農民。他在一年前還是地主家的長工，自然沒有讀過書；而在解放之後，由於在反霸雙減時的積極表現，被選

爲鄉主席，隨後又被派到縣城裏去學習了兩個月。當我們到達那裏的時候，他很殷勤地招待着我們。而當我們共同工作着時，他的態度謙遜極了，遇事便和我們商量。他雖是一個「冒年紀的」，但做事很慎重，待人也和氣，發言卻非常簡明扼要，所以能够贏取羣衆的擁護和愛戴。由於自學的勤勉，他已經培養起看報的能力。在開大會的時候，他能把發言的綱要寫在紙上，然後登台演說。如果你初次見到他，你絕對想不到他是一年前一個目不識丁的長工。當土地改革快完成時，他結了婚。我曾經參加了他的婚禮。土地改革完畢，他又被選爲出席專署農代會的代表。他可以說是一個農村中的新人物。他是年輕的，他有着非常遠大的前途。

我不能忘記那裏的農民協會的主任，一個二十年前赤色農會會長。他的年紀已經五十多歲了，沉默寡言，耳朵也不大靈便——據他自己說，年紀小的時候玩豆子，把豆子塞在耳朵裏，發了脹，挖不出來，把鼓膜爛壞了——但辦事卻很認真負責，待人尤其和藹可親。有人說他太不開口了，遇事打不開，但人人都稱讚他，擁護他。一開始，他和我便建立起很好的感情。我們時常彼此手撫着背，嘴接着耳——自然是爲了他的耳朵不靈便——的談天。他是一個赤貧的人，田是批的人家的，屋也是借的人家的；不過，他很樂觀，他那時常含着

旱煙管的嘴，也時常浮着笑。在我們的工作同志中，有一位畫家，給他畫了一個像；他高興極了，一個小孩子似地笑着。土地改革開始後不久，在整頓組織、擴大農會基礎時，主任一職選上了一個青年團員，而他則被改選爲書記。他更高興，他說：「這一下好啦。同志，我是一個耳聾嘴啞（指不善說話）的人，那裏做得主任呢？書記倒是我當得好的，我的筆倒很有些用處！」在辦公的時候，他架起一副老光眼鏡，非常認真嚴肅的幫助新選上的年青主任辦事。我們說他是標準的民主作風，他便笑着說：「同志，現在不正是民主世界嗎？」分配了土地和果實之後，他的田也有，屋也有了。他分得的屋子是一個地主的高大樓房，他笑咪咪的說：「這一下可給我過過地主癮啦。」人家批評他這句話說得不好，他馬上改口說：「屋是地主的，人是打地主的——打地主的人住地主的屋，這便叫做農民大翻身嘛！」

我不能忘記那裏的一個農會女委員，人家叫她「端大嫂」的，左眼有點往上吊，年紀約在三十歲左右。她是一個積極分子，在發動婦女上出了很大的力量。在土地改革剛一開始時，她被選做出席專署婦代會的代表。她興奮極了。她說她這輩子連八里路外的區上也沒有去過，更談不上二十多里外的縣城裏了；至於坐汽車又坐輪船到幾百里路外的專署裏去，連做夢也沒有做到過。她自然不願意放棄這個難得的好機會。誰知道她的男人

偏不讓她去，理由是婆婆老了，眼睛又已經半瞎；她自己兩夫婦沒有生養，從叔嬸那裏過繼來一個兩歲多大的孩子，因為過於疼愛，弄得寸步也不能離開她，如果她去專署開會，一走便是半個月，丟下孩子不管，會惹人閒話。她灼急得不得了，便來央我去打通她男人的腦筋。是一個雨天，踏着泥濘，我到她家裏去。在一間低矮的茅屋裏，我和她的男人談了近兩小時的話。她在一邊站着，紅着臉向男人辯說道：「我是向工作同志去請假的，我說我實在不能去，我的家務重。可是工作同志就不肯依，他一定要我去，現在他就到我家來啦，你就向工作同志給我請一個假吧。」——我聽着，我懂得她為什麼要這樣說的緣故。但是白白花費了兩小時，她男人依然不答應。沒有辦法，她也只好放棄了去專署參加婦代會的機會。當她送我出門時，我看見她的眼睛紅紅的，只差沒有哭出來。雖然這樣，她工作依然很積極。到了評劃過階級成分之後，她又被選為出席縣農代會的代表。這一次，男人的思想覺悟提高了，他已經變成貧僱農中的積極分子，所以不僅不阻止她去開會，反而揹着她的行李，送她上路去。開會回來，她笑着對我說：「老王（她不再用『同志』相稱了），這一下我的老板思想打通啦！你知道那天你到我家裏去一趟，你剛走，他便打了我一頓哩。」我笑着說：「不要緊的，下一次他要是去開會，你也可以打他一頓！」她也

笑着說：「那可不用啦，他也成了積極分子啦，他說他要爭取做團友呢。」

我不能忘記那裏的一對青年兄弟，哥哥是青年團員和副村長，弟弟也是一個積極分子。我曾經在他們家裏住過一個多月。白天，如果不到田裏去做活，也不到山上去砍柴，兄弟兩人便和我一起學習政策；晚上，我們一起到一個祠堂裏去開會。我們彼此相處得像一家人。不僅他們兄弟，就連他倆的老祖母和小妹妹，也和我有了非常深厚的感情。當我患病的時候，他倆替我請「醫生」（一個曾經在軍醫院裏工作過的農民），進城買藥；他倆的母親替我煮稀飯，小妹妹替我送開水，老祖母替我「敲頭風」（用手敲摸腦門以止頭痛），簡直動員了全家的人馬侍候着我，使我感到極大的不安。分配田地，他們家進了三十擔穀田，兄弟兩人便計劃着怎樣把田種好，明後年怎樣把茅屋升成瓦屋。土地改革快完時，做弟弟的討了親，自然我參加了他的婚禮，喝了他的喜酒。那一天，我在他家裏消磨了整整一天（我原來已經從他們家搬開）。他倆的老祖母簡直把我看成她老人家的兒子或孫子，拉着我不讓我走。我們工作同志離開那個鄉的時候，他們兄弟兩人一直送我們進城。在城裏街上，我買了一支鋼筆送給哥哥，再買了一把花傘送給弟弟（他可以送給他的新媳婦）。他們兄弟兩人緊緊拉着我的手，緊緊捏着我的手，眼睛紅紅的，連話也說不出來了。

最後，兄弟兩人才哽哽噎噎的要求我別忘記給他們寫信，要求我明年春天再到他們鄉裏去看大生產。

要一一都這樣列舉出來是不可能的，我只能在這裏總的說一句——一想到那裏的那些善良而樸實的農民們，想到他們的鬭爭和鬭爭的勝利，想到他們美好生活的遠景，想到他們的智慧和能力，想到他們對個人的好意和幫助，在我的心裏便充滿了喜悅和感激。爲了好好保持這種感情，自然也爲了把他們的遭遇和鬭爭轉述給更多的人們，我寫下了這些雜記；同時，我願意把這個小小的集子呈獻給他們，作爲我小小的贈物。

一九五一年二月十七日長沙

重見太陽的墓碑

天下着雨。在雨中，由縣委會的劉同志作嚮導，出了平江縣城，渡過城邊的汨羅江，走向三新鄉的上坪村。

我們是去探訪朱璋烈士的墳墓。

朱璋烈士是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時代平江縣許多革命英雄之一，當時，他是平江的少共縣委書記。長沙馬日事變後，革命組織被破獲，在平江的朱璋同志，便於一九二八年舊曆二月初八日被捕入獄，受到反動派的嚴刑拷打，他始終沒有透露出一點消息。爲了救他（自然也還有其他的原因），四鄉的農民赤衛隊，在黨的號召下，集合十多萬羣衆，於二十五日的夜間，大舉攻城。結果，由於武器的不足和組織的不強，攻城失敗。而朱璋同志，便在二十六日的清晨，被反動派砍殺在城內孔廟前面的月池塘裏。當他被押赴刑場的時候，還高呼「中國共產黨萬歲」的口號。當時，他才十七歲。

他被害後，屍體由革命同志偷偷的運出城去，埋葬在他家屋旁邊的張家墳坪。一九三